

南龕“天开金榜”考

李继鳌

南龕“天开金榜”书法石刻，以其历史悠久、规模宏大、笔力遒劲闻名于巴中。这一书法石刻镌于何时？出自何人之手？其背后有怎样的历史传奇？本文试图为读者揭开其神秘面纱。

“金榜山”的由来—— 古人对山形的美好联想

从千年古城巴中的中心——巴人广场向南眺望，视线越过古老的巴河水，雄伟的三号桥，穿过繁华的商业街，迎面就是闻名巴蜀的南龕山。

这里，不仅以“国之瑰宝”隋唐石窟、川博、将帅碑林名扬天下，还隐藏着一处气势恢宏的书法石刻——“天开金榜”。

这四个大字镌刻于南龕山西北、玉佛寺背后长 300 米的绝壁上，高 3 米，宽 2.6 米，数里之外，清晰可辨。它笔画苍劲，力透山石，承载和喻示着古老巴州的科甲鼎盛，穿越历史烟云，又仿佛是在幽幽苍壁间射出的一道道光芒，投射在巴城上空，护佑着汉昌故城、巴江字水。

说到“天开金榜”石刻，首先要从南龕的前身“金榜山”说起。清道光《巴州志·地理志·山川》记载，“南龕山，古

名化成山。山之北岩为金榜山。”“金榜山，古名丹梯山，即南龛后岩，一名书案山，当州城西南，如案如榜故名。”

由此可见，南龛山在古代非现在通指的一座山，而是分为“南龛山”和“金榜山”两处。金榜，为古代科举考试殿试后录取进士揭晓名次用的布告，因用黄纸书写，故称金榜。金榜山，更因诸多名胜古迹而闻名遐迩。清道光《巴州志·山川》记载，金榜山“西有仙人捣练石，俗名印斗石，形正方，高阔俱十余尺。自下望之，巍然欲坠。”印斗石，即今天印盒石，分别为一高数米、形如玉印的“印石”和一状若印盒的“盒石”组成，可惜“盒石”在上世纪 80 年代修路时被毁损。

胜迹乃天赐，人文增光彩。清嘉庆《四川通志》记载，金榜山“山腰有光射文庙，辄发科第。”《巴州志·地理志·山川》载，“岩腹今为文昌阁，乃唐张曙丹梯书院遗址。”明代《保宁府志》和曹学佺《蜀中名胜记》记载“丹梯书院，在南龛山，因其山重迭耸秀，有若丹梯而名”。

从上不难看出，金榜山之名，应该是来自于古人对山形的美好联想。此山与“印斗石”“丹梯”等天然景观形成“金榜挂印”“丹梯直上”的独特景观。金榜、印斗、丹梯，三个词语包含吉祥寓意，兆示着巴州这方水土地灵人杰、科甲鼎盛。因此，后人顺理成章在山中修建了文昌阁，并在山岩下修建了“丹梯书院”。

悬崖上留墨宝—— 张衍题写“金榜山”

鸿蒙开辟，岁月绵延。金榜山迎来了她宿命中的一个人——张珩。

张珩何许人也？清道光《巴州志·地理志·山川》记载，“绝壁有张珩镌金榜山三字，高阔四尺许。”《巴州志·历代文·题名》载：“‘金榜山赐进士第秋官云间张珩书。’此刻在文昌阁右岩绝壁。字大上尺许，年月剥落。”《巴州志校注》引用明《保宁府志·桥道》注释：“张珩，江苏华亭进士，成化间任保宁府推官。”唐光宅元年，改刑部为秋官，后世遂以秋官或推官通称刑部。

清道光《巴州志·历代文·国朝》收录的《金榜山吟会亭诗二首》，作者也为张珩。

金榜山吟会亭诗二首

其一

江上青山山下亭，士民指路共游行。
黄花白酒且同醉，物与民胞方称情。
落日远峰含翠霭，暖烟芳草载飞觥。
于今四海浑无事，诗酒何妨老此生。

其二

少年辛苦数行书，案牍劳形四十初。
且尽山间林下乐，好为今日古人愚。
经时又饮巴中酒，问政宜来陇外车。
天理流行静须见，海鸢飞处跃池鱼。

该诗下面，《巴州志校注》注释：“据明《保宁府志·保障》，张衍，直隶华亭人。进士，成化十二年（1476），由工部主事，左迁保宁府推官（主管刑狱）。”明代，江苏先后称直隶、南直隶，辖今江苏、安徽和上海，故《巴州志校注》和明《保宁府志·桥道》对张衍籍贯注释是一致的。但清道光《巴州志》将张衍诗作列入《历代文·国朝》有误。众所周知，大清公元1616年立国，而成化（1465—1487）为明宪宗朱见深的年号，早在清朝建国前140多年。明成化年间的张衍怎么可能活到“国朝”（清朝）？这到底是清道光《巴州志》编纂者朱锡谷等人的疏忽呢？还是真的存在明朝和清朝两个“张衍”？

更令人费解的是，《巴州志校注》引用明《保宁府志》注释，认为张衍为明代成化年间人。而笔者在南龛“天开金榜”石刻旁看到一处题记：

昔唐秋官张公衍题金榜山三字，年久风雨剥蚀，
后人仿旧迹于丹梯阁侧书天开金榜以复古制，行见地
灵人杰，科名甲第之盛，必有继美于前者。

公为古代对男子的尊称，故此处张公衍即张衍。奇哉？张衍难道又成了唐人？在我疑惑之际，六月再上金榜山，意外在“天开金榜”石刻下发现2006年立的《天开金榜重放光彩》大理石碑。碑文记载：

故唐武则天时曾供职刑部的华亭（今上海松江县）
人张衍移任保宁，莅巴之时，见丹梯山，形似书案，

峰有印盒石相衬，便书金榜山三字，镌于山上，自此其山名为金榜山。

该碑系巴州有识之士感慨于“天开金榜”石刻被林木遮掩、苔藓覆盖，乃捐资将其修葺一新，清除灌木，安装镁光灯，方便观瞻。碑记中，认为张衍系唐代武则天时期的刑部主事，所不同的是籍贯变成了今上海松江县之“华亭”。

石刻疑云——

张衍是哪个朝代的人

梳理一下，不难发现存在三个不同时期的“张衍”：第一个是明《保宁府志》记载的明成化年间的张衍，第二个是《巴州志》诗文记载的清代张衍，第三个是石刻题记、《天开金榜重放光彩》记载的唐代张衍。那么，是题记碑记错了呢？还是说真有三个姓名相同但年代不同的“张衍”？

先看题记，落款为“提督军门张必禄、荣成县知县唐之荣、候补同知张由基、刑部主事唐正恩……”这些均为清代巴州的名人乡贤，张必禄是被清道光皇帝赐予“励勇巴图鲁”、咸丰皇帝追封“太子太保”的将军；唐芝荣为清嘉庆举人，官至荣成知县；唐正恩曾任刑部主事江苏司、江苏阳湖县知县等职……其余七十余人均为贡生、廪生、监生等功名的人。按理说，他们将张衍年代记错或造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，但他们认定张衍是唐人的依据又来自哪里？

话说回来，如果题记没有错，是否是注释《巴州志》的人误将另一个姓名相同的“张衍”，当成了题写“金榜山”的

“张衍”？历史上两个同名同姓的人担任过同一官职，都到过巴州，一个题写“金榜山”三字，一个写下《金榜山吟会亭诗二首》，他们重合的概率又有多大？抑或是《保宁府志》记载的明代“张衍”根本就没有题写过“金榜山”三字，石壁上的大作真系唐代“张衍”所为？或者说“张衍”本身是唐代人，是《保宁府志》将其年代弄错了？

就在思路“打架”之际，笔者专门请教了巴中地方志专家彭从凯先生。他认为，古代志书编修一般需要地方提供基础资料，由于张衍并非历史上的名人，不排除巴州官员向《保宁府志》编撰者提供的基础资料有误的可能性。“但在史学上，普遍倾向尊重田野考古调查，因为实物摆在那里，写志书的人并非全部都到过现场看过实物。”

鉴于张衍年代难以断定，我决定在“天开金榜重放光彩”碑记上打开缺口。然而在走访中，我了解到当年倡捐者早已离开巴中，联系不上。就在考证陷入停滞之时，笔者意外获得一本刘瑞先生编撰的《南龛诗文选注》。先抄录书中第一辑《南龛十二景》诗第 11 首《天开金榜》于下：

柳体珠光峭壁悬，丛林郁郁耸江天。
晓同印斗迎金虎，夜伴奎星映玉蟾。
向美丹梯吟笔冢，更誉金榜亦书山。
万般功业从勤奋，皑皑梅花香岁寒。

在该诗下面，刘瑞注释：“今‘榜’字下石刻自左至右竖刻碑记云：‘昔唐（应为‘明’）秋官张公衍书金榜山三字，

年久风雨剥蚀，后人仿旧迹于丹梯阁侧书天开金榜……’今据明《保宁府志·历官》‘推官张衍直隶华亭人，进士，成化十二年（1496）以工部主事左迁’。因此约为明中叶人。”刘瑞认为，张衍应为明代人，对清代题刻中张衍是唐代人的说法进行了纠正。在该书第三辑《巴中石窟·南龛摘要》“南龛题名题词补录”中，刘瑞亦在“天开金榜”题记中做了张衍是明代人的更正。但是，刘瑞先生并没有给出理由和依据。

笔者综合分析，张衍是明朝人的说法比较靠谱。因为，假设张衍是唐代人，他题写的“金榜山”三字在当时应是具有一定知名度的胜迹，否则不足以达到让清代张必禄、唐芝荣等名士循仿旧迹“以复古制”的程度。既如此，那么“金榜山”或“金榜”也应该会被唐代及以后游览南龛的文人墨客在诗词歌赋、石刻碑记等中有所提及。然而，笔者查阅了清道光《巴州志》收录的近200首诗词、21处南龛题名，特别是刘瑞编撰的《南龛诗文选注》堪称历代“南龛诗词大全”：收录南龛摩崖诗词37首，铭文4篇，南龛诗11首，包括镌刻于南龛不属南龛范围的诗词23首（如杜甫《九日寄严大夫》），均未发现唐代至元代之间有言及“金榜山”和“金榜”的。如果张衍是唐代人或者碑记所说的武则天时期人，那为何唐代巴州刺史严武、羊士谔、张祜、宋代巴州通判宗泽等名人在巴留下的诗文中没有提及“金榜山”？特别是羊士谔在巴作诗30余首，南龛、西龛、东龛、后溪等巴城胜迹无不涉及，其中南龛3首，无一字提及“金榜山”。

宋代何俛作《何俛游记》，记载了他游南龛的所见所感，其中有这样一段：

游南山，宴于怀古亭，对古楠之乔蔚，瞻石龕之嵌岩酒既半，乃纵步相与登山顶绝览阁，观江山之气象，览城郭之形势，已而分茶，啜建溪新茗，谈论飞屑(眉)，不倦。逾时，又纵行至飞霞亭，观仙人捣练石，周回四顾，有萧散凌云之趣。少顷，复纵行下山，至再休亭略憩坐，眺望野景，怀想古意。移刻，复至怀古亭，终席而归。

文中“仙人捣练石”即印盒石，作者“周回四顾，有萧散凌云之趣。”唯独未发现“金榜山”石刻，充分说明宋代并无此胜迹。那么，明代呢？先看《南龕诗文选注》辑录的陈凤《题丹梯书院》诗：

书院层岩上，丹梯半有无。
草蒙碑龕质，雨洗字模糊。
笔冢秋云冷，琴台夜月孤。
我来觅归迹，猿鹤起惊呼。

明代傅瑛也有《丹梯书院》诗：

南山书院古丹梯，赢得诗人入品题。
岭上仰观红日近，岩前俯瞰白云低。
碑文有字莓苔合，诗颂无声鸟雀啼。
传说当年工部在，风光不让浣花溪。

陈凤，巴州人，明成化五年间（1469）进士，官至南京刑部主事。傅瑛，临安（今杭州）人，明成化七年（1471）任巴州训导。丹梯书院旧址在金榜山下，两者近在咫尺，如果当时真有“金榜山”石刻，陈凤、傅瑛二人游览时应该会在诗中提到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明《保宁府志》记载的张衍与陈凤、傅瑛为同时代人。笔者推测张衍题“金榜山”时间应是担任保宁府推官之时，也就是陈凤和傅瑛游览丹梯书院几年之后的事。

而当张衍题写“金榜山”、写下《金榜山吟会亭诗二首》后，后人诗作中屡屡提及金榜山。如明代朱尹的《南龕耸翠》。

谁将危岫对城安，城里家家当画看。
晚雨色滋岩草湿，霜风声落岭枫干。
三千地界开金榜，十万天丁铸玉峦。
昨日龕头望京阙，云霄岚重不胜寒。

《保宁府志·历官》记载：“朱尹，嘉靖八年（1529）任巴州知州”，这进一步证明张衍是明代成化年间（1465—1487）人。此外，还有清人吴琦的《乾隆戊子游南龕》：

云深胜景许登探，绝顶遥瞻万象涵。
巴字江环金榜北，印文石镇木楠南。
杜陵诗壁埋苍藓，张曙书堂锁夕岚。
惟有岩前诸佛古，尚留昙树护禅龕。

在“金榜山”石刻之后，巴州又有了“金榜桥”。《巴州志》记载：“金榜桥，在州南二里，金榜山侧。”该桥被清代魏冠军写入《游南龕寺偶题》诗中：

闲步纡回到化城，南龕何处访漆僧。
云屏直耸星河近，岩石嵯峨佛像凭。
径曲化黄延处士，楼高竹翠扶秋鹰。
我来吊古章怀墓，金榜桥边月又明。

鉴于以上原因，笔者认为张衍是明代人较为可信。当然，这仅为一家之言，限于张衍并非史上声名显赫之人，缺乏志书详细记载，囿于笔者掌握的史料和自身学识有限，该问题有待更多有兴趣人士共同探讨。

重光古迹——

清人镌刻“天开金榜”

拨开历史迷雾，历史上确实有一个叫张衍的人题写了“金榜山”。300多年后，石刻风化殆尽，一批巴州乡贤名士捐资镌刻下“天开金榜”四个大字。

在2007年启动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，原巴中市文物局副局长汪信龙曾对“天开金榜”石刻进行测量：“石刻分布在长300米，宽10米的南龕坡北半山腰石壁上，面积3000平方米，为清咸丰六年凿刻，每个字长3米，宽2.6米，字距约25米。”

如此气势磅礴的石刻出自何人之手？系清代巴州名士、书法家唐芝荣也。《平昌文化系列丛书·古今人物》记载，唐芝荣（1775—1858），平昌县驷马镇雷山人，家道贫寒，八岁丧父，由兄资助求学，博闻强记。20岁赴试，文章竟被官绅子弟夺去，名落孙山。归里继续苦读，终于中举，后任浙江晋云知县、山东荣成知县等职。唐芝荣勤政爱民。“一贫民盗窃，被捕鞭打，伏地嚎哭，芝荣亦泣曰：‘尔本善良百姓，奈何为盗？尔后定痛改前非！’”一年夏天，骄阳似火，狱中暑热难当。芝荣命令打开囚门通风，一囚犯乘机逃逸。州府查处下来，按律应将芝荣革职。百姓得知纷纷上书，称其清廉，方得宽宥。道光三十年（1850），古稀之年的芝荣辞官从教，授涪州（涪陵）学正。咸丰七年（1857），乞归故土，次年病故，诰封“奉天大夫”。

当“金榜山”三字风化殆尽，巴州人不愿见到这一胜迹消失。便由张必禄、唐芝荣等人承头，谋划重新镌刻。张必禄逝世于清咸丰元年（1851），石刻镌刻成功是在咸丰六年（1856），说明张必禄没能等到夙愿实现的那一天。唐芝荣时年81岁，但因其书法造诣最深，于是众望所归地由他执笔，模仿张衍笔迹题写“天开金榜”，众人再请工匠将其镌刻于南龛北岩。

“该石刻具有一定的历史、书法和雕刻艺术价值，也是巴中一道不可多得的人文景观！”汪信龙说。

金榜题名、独步丹梯、执掌官印，是古代读书人的梦想。而金榜山、印盒石、丹梯刚好契合了他们的想法，加之有天开金榜、丹梯书院、文昌阁等人文景观的加持，使得南龛从巴州

诸山中峭拔而起，从文人雅士的吟唱中脱颖而出，成为一座承载巴州文运昌盛的瑞峰……